

常规威慑论

CONVENTIONAL DETERRENCE

JOHN J. MEARSHEIMER

[美] 约翰·米尔斯海默 著

阙天舒 译

东方
编译
所译
丛

 上海人民出版社

这是一本关于战争起源的书。书中提出的问题是：对于爆发大规模常规战争的可能性，为什么有的国家会选择进攻性的战略，而有的国家却与之相反？米尔斯海默研究了许多导致重大常规战争的危机，来解释威慑为什么会失败。他首先聚焦于盟军和德军在1939—1940年间的决策，分析了盟军为何没有在向德军宣战的同时就发起攻击，也解释了德军反而率先对盟军展开进攻的原因。当话题转移至中东，他比较了以色列和埃及在该地区爆发大规模常规冲突时的不同战略思想。之后，批判性地分析了北约和华约的相对优势和劣势，来推测常规威慑在未来危机中发生的可能性。他还关注诸如精确制导武器对常规威慑的影响，以及机动战与消耗战之类相对技术性的问题。除了分析威慑背后的军事因素，对于步入战争状态的国家 and 民族，作者还分析了军事因素与更宽泛的政治因素间的互动关系。

米尔斯海默为国家防卫政策的分析树立了榜样。在集中研究威慑和现代战争等一些重要但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问题时，他表现了对问题分析侧重点的出色把握。他问道，为什么面临大规模常规战争的国家会接受或避免进攻性的战略？在回答这个问题的同时，米尔斯海默对战略性的核僵局所涉及的政治和感知问题也进行了解析。这本书在历史和技术方面的细节处理得很好，是一本复杂而透彻的书，值得任何研究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学者认真关注。

——《政策分析与管理杂志》

约翰·米尔斯海默写作的时机恰到好处。目前有很多关于加强北约常规部队必要性的讨论，但还没有可以评估所有这些提议的概念框架。本书是一项经过仔细论证、文笔优美的研究，有助于迅速提高相关辩论的水平。最重要的是，本书有效地利用了历史来阐明当代问题。

——劳伦斯·弗里德曼，《新共和》

这是一项有智慧的、经过充分论证的、成体系的研究。

——《外交事务》



上海人民出版社
官方公众号



知世书坊
探索新知，触摸世界

上架建议：世界政治

ISBN 978-7-208-16023-1



9 787208 160231 >

定价：69.00 元
易文网：www.ewen.co

常规威慑

CONVENTIONAL DETERRENCE

JOHN J. MEARSHEIMER

[美] 约翰·米尔斯海默 著

阎天舒 译

东
方
编
译
所
译
丛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常规威慑论/(美)约翰·米尔斯海默
(John J. Mearsheimer)著;阙天舒译.—上海:上
海人民出版社,2021
(东方编译所译丛)
书名原文:Conventional Deterrence
ISBN 978-7-208-16023-1

I. ①常… II. ①约… ②阙… III. ①威慑战略-研
究 IV. ①E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 256826 号

责任编辑 王 琪
封面设计 小阳工作室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东方编译所译丛

常规威慑论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 著
阙天舒 译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 张 16.5
插 页 4
字 数 244,000
版 次 202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6023-1/D·3475
定 价 69.00 元

序 言

这是一本有关战争起源的书。为什么国家在面临一场大规模常规战争的背景下,有时会发起攻击,而有时不会?例如,为什么英国和法国在1939年9月3日对德国宣战后没有采取军事行动?反之,为什么德国在1940年5月10日通过攻击西方盟国来结束所谓的互相对峙的状态?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当双方军队在危机形势下互相对抗时,常规威慑到底在什么条件下会失败?

接下来的章节讨论了导致主要常规战争的一些危机。通过识别其中某些共同的因素,我希望能够提出一些观点以阐明常规威慑的成败。我的目的有两个:第一是解释在历史上一些重要事件中导致威慑失败的原因,例如,我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和阿以战争中威慑的成与败;第二是阐明当代政策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一项对于过去“威慑失败”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威慑”在中欧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作用。此外,我还关心一些相对技术性的问题,比如精确制导武器以及关于机动战和消耗战间的争论。简而言之,我的书中有很多关于常规战争行为的论述,详尽地回答了军事战略和战术问题。这种讨论对于分析比较技术性的问题是必要的,了解军事战略对于解释曾经威慑失败和成功的案例也是十分必要的。显而易见,常规威慑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军事战略所决定的。

战略和战术的主题对本书的写作范围提出了一个关键点。各种各样的因素影响着一个正在考虑战争的国家,其中有很多是非军事因素。首先,我将集中讨论构成决策过程基础的军事考量,也可以说是导致战争或远离战争的军事思想;其次,我将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军事因素与使一个

国家走向侵略的、更广泛的政治考量之间的相互作用。

令人惊讶的是,现实中关于常规威慑的论述少之又少。军事威慑的其他两个主题已经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第一个主题是核目标战略,更具体地说,就是不同的战略,如反击力(counterforce)和反击价值目标(countervalue)如何影响超级大国之间的威慑。我把第二个主题称为“承诺的可信性”(credibility-of-commitment),考虑到使用武力带来的巨大风险和成本,一个国家是否会使用武力来捍卫某些利益,尤其是在国界以外的区域。我毫不怀疑这些主题的重要性。但我认为对于它们的讨论掩盖了第三个同样值得分析的重要领域,那就是常规威慑。

本书诞生于1976年的春天,当时我还是康奈尔大学一年级的研究生,参加了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 Rosecrance)的战略研讨会。在课程早期,他便建议我研究这几个主题中的任意一个,常规威慑便是其中之一。虽然我之前几乎没有考虑过这个主题,但是我很快就发现,与之相关的著作十分稀缺。

我的课程论文中概述的理论与本书内容存在相似之处,但也有许多重要的差异。毫无疑问,最终的成果是在最初基础上取得的巨大进步。写作对我而言不是一件易事。首先,想要提出一个理论是极其困难的;其次,由于该主题之前研究的学者很少,我几乎得不到什么指引,幸而我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帮助。在此,我想对那些帮助过我和机构表达感激之情。

在我的选题领域中,著名专家乔治·奎斯特(George Quester)和理查德·罗斯克兰斯帮助我制订和完善了基本论点,并通过许多方式协助我。他们的支持和鼓励至关重要,因为接下来的部分直接挑战了他们的一些主要观点。另外,罗伯特·阿特(Robert Art)、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和威廉·泰特奥特(William Tetreault)都作出了非常详细而有用的评论,影响了本书的定稿。哈佛大学的国内政治和安全政策工作组的大部分成员也仔细地阅读了这份手稿,成员中有迈克尔·曼德尔鲍姆(Michael Mandelbaum)、史蒂文·米勒(Steven Miller)、巴里·波森(Barry Posen)、杰克·斯奈德和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等。两次会议小组讨论都帮助我阐明了自己的论点,所以我十分感谢下列人员提出的宝贵意见:罗伯特·伯曼

(Robert Berman)、理查德·贝茨(Richard Betts)、海因里希·布赫(Heinrich Buch)、艾略特·科恩(Eliot Cohen)、沃纳·丹豪泽(Werner Dannhauser)、史蒂文·戴维(Steven David)、玛丽·休斯·德菲(Mary Hughes Durfee)、约瑟夫·格里科(Joseph Grieco)、迈克尔·汉德尔(Michael Handel)、洛塔尔·霍贝尔特(Lother Höbelt)、威廉·马可(William Mako)、马修·墨菲(Matthew Murphy)、威廉姆森·默里(Williamson Murray)、斯蒂芬·罗森(Stephen Rosen)、威廉·施瓦茨(William Schwartz)、贾妮斯·斯坦(Janice Stein)、西德尼·塔罗(Sidney Tarrow)、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和达尼·扎米尔(Dani Zamir)。

与此同时,我得到了各种渠道的资金支持。康奈尔大学和平研究项目的资金允许我能够在中东、欧洲和美国开展研究。我同样受到了下列机构的支持:军备控制和裁军机构、布鲁金斯学会、康奈尔大学、福特基金会、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世界政治研究所、克利夫兰的犹太人职业服务组织和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没有这些慷慨的帮助,我不可能完成这本书的写作。

1978年夏天,我在军备控制和裁军机构实习,在那里我有机会和专家讨论各种技术性的问题,并且受益匪浅。我特别想对菲利普·卡伯(Phillip Karber)表达感激之情,他花了很多时间和我讨论装甲战争。1979年9月至1980年8月,作为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在那里我写出了本书初稿。1980年9月至1982年8月,作为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的博士后研究员,我在那里重写了好几次手稿。我十分感谢这两个机构中的许多人对我的帮助,特别是塞缪尔·亨廷顿和约翰·斯坦布鲁纳。我也非常感激欧洲、中东以及美国的许多人,他们就本书主题的各个方面与我进行了详尽的交谈。

本书的第六章是在1982年夏天发表在《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上的一篇文章的基础上略作修改而成的,而第七章则改编于《生存》(*Survival*)上1979年3月—4月的一篇文章,因此,我十分感谢这两家期刊以及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允许我将这两篇文章收录到本书中。另外,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利德尔·哈特军事档案中心也慷慨地允许我引用利德尔·哈特的个人档案。

马丁·范·克里费德(Martin Van Creveld)曾在《供应战争——从华

伦斯坦到巴顿的后勤史》(*Supplying War: Logistics from Wallenstein to Patton*)中说过：“后勤占据了高达十分之九的战争业务”[*Supplying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231]。他的话同样适用于写作，正如所有人都知道是谁完成了写作。虽然作家在许多领域需要援助，但打字在这方面特别重要。我十分感谢格特鲁德·菲茨帕特里克(Gertrude Fitzpatrick)、珍妮特·豪钦(Janet Haouchine)、罗纳德·莱弗利(Ronald Lively)、南希·索科尔(Nancy Sokol)和琼·特沃梅尔(Jean Twoomey)在后勤领域作出的贡献。最后，我衷心感谢吉尔福德集团的马西娅·布鲁贝克(Marcia Brubeck)和康奈尔大学出版社的凯·朔伊尔(Kay Scheuer)，他们为最终版本的编写提供了很多帮助。

我将此卷献给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我的妻子玛丽。她多次输入每个章节的手稿，帮助我无数次地校对和修改，并精心编辑了几乎每个章节。她不仅确保了这份手稿的可读性，也带来了许多实质性的批评意见。此外，她始终给予我鼓励和支持，尤其在那些最黑暗的时刻。如果没有她，这本书的出版将会受到重大的影响。她将赢得接下来所有最好事情的荣誉。

约翰·米尔斯海默
伊利诺伊州，芝加哥

目 录

- 序言 /I
- 第一章 引言 /1
- 第二章 常规威慑论 /15
- 第三章 盟军不进攻德国的决策
(1939年3月—1940年5月) /62
- 第四章 德国进攻西线的决策(1939—1940年) /98
- 第五章 常规威慑论与阿以冲突 /137
- 第六章 中欧地区常规威慑论的前景分析 /174
- 第七章 精确制导武器与常规威慑论 /202
- 第八章 结论 /217
- 参考文献 /227

第一章 引言

自 20 世纪 60 年代初,美国在与苏联的抗衡中逐渐加强了其对常规军事实力的依赖。¹美国政策的制定者经常强调,必须将核门槛保持在尽可能高的水平,其观点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北约现在正认真考虑只打常规战争,这类常规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什么不同。有证据表明,自 20 世纪 70 年代初,苏联就一直在为欧洲可能发生的无核(常规)战争做准备。²

核武器在阻止欧洲的战争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为了达到威慑的目的,近年来核武器日益增长的副作用,使人们逐渐增加了对常规平衡的兴趣。因此,传统威慑问题似乎值得引起学术界更多的关注。我们必须明确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一次危机中双方军队面对面——如欧洲的华约和北约,决定潜在侵略者是否选择发动战争的因素是什么?哪些军事考虑可能导致苏联对北约发动常规攻击?

众多威慑失败和随之而来的常规战争的历史事实可以用来回答上述问题。尽管存在个别案例研究,但很少有学者能够真正运用这些历史事实来解释威慑问题。此外,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两种现有的传统威慑理论是可区分的,但这两种理论都没有经过特定危机的验证,还没有一项已发表的研究是基于对过去涉及常规威慑案例的仔细研究,进而提出一般性主张。例如,没有人试图比较 1940 年德国进攻同盟国的决定和 1967 年以色列袭击西奈半岛的决定。通过比较这些重要事件,从中汲取教训,以便于维持北约或华约平衡。当然,一个合理的常规威慑理论不仅仅是揭示当前的政策问题。在许多复杂的历史事件中,它成为理解战争爆发的

原因的关键。

定义目标

威慑,在其最宽泛的理解中,意味着规劝对手不要发起一项特定的行动。因为(对手)所感知到的收益,并不能证明其预估损失和风险的合理性。战争决定的作出不仅是出于军事的考量——一国的实力是否有能力实现其在战场上的目标,³其他的非军事因素也会影响威慑的作用。如果我们假设成功的军事行动能够获得广泛的、肯定的政治权益,那么我们必须认识到影响这些政策制定者的一系列因素。⁴具体来说,领导人必须考虑到非军事性质行为的风险和成本。决策者可以很好地评估盟国和对手可能作出的反应,国际法的各个方面,诸如联合国这样的机构可能作出的反应,以及对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总之,广义的威慑定义是:威慑最终是以下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函数:领导人预估从军事行动中得到的政治收益,以及大量军事的、非军事的代价及风险。

如果可能的话,发展这种理论需要将所有因素都考虑其中——而这也是极其困难的,因此我必须缩小我的研究范围。⁵首先,我专注于基于威慑下作出的军事考量的研究。其次,我专注于研究这些军事考量和预估的政治收益、风险及代价等非军事因素之间的关系。我试图去回答下面两个问题:首先,那些考虑采取军事行动的决策者,是如何受到战场预期结果影响的?其次,这些军事考虑和那些导致一国发动战争的广泛的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在此我需要强调,我并不是尝试分析这些政治力量的细节。

惩罚性威慑与拒止性威慑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区别。惩罚性威慑是通过扬言摧毁对手的公民人口和工业来阻止对手的行动;拒止性威慑需要使对手信服其不会在战场上达到目标。⁶迪安·艾奇逊恰当地表达了这种区别:“我们认为阻止苏联在西欧强加意志的唯一威慑力量是这样一种信念,即只要苏联一有企图,美国力量将被用于阻止它。如果必要的话,美国力量将对苏联施加莫斯科政权所不愿经受的伤害。”⁷

惩罚性威慑通常与核武器联系在一起,但有时也与常规武器有关。⁸反之,战争的拒止通常与常规部队联系在一起,尽管有一种学说认为核武器可以而且应该在战场上使用。⁹正如此研究中的定义,常规威慑是通过常规部队来阻止侵略者实现战场目标的能力的函数。因此我关注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当两支大规模的军队在危机中面对面时,出于何种军事考量使得一方认为其能够发动一次成功的军事行动?

常规威慑与战场结果直接相关,也使得“战场”一词的内涵更加广泛。本书的研究考察了与一种特定类型的常规战场有关的威慑的失败,在这种战场上,两支大规模的军队直接面对彼此,如果爆发战争,两支军队会在相对广阔的空间中直接交战。因此,我的理论并不适用于像越南战争那样的游击战,也不适用于像珍珠港那样的海空战。

然而,进一步设定理论的边界是必要的。虽然上述定义的那种常规战争在整个历史进程中都能找到,但我的理论只适用于现代战争,即装甲主导的战场。我无意解释普法战争或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威慑失败的原因。之所以如此确定本书的研究范围是因为,是否参战的决定是基于对战争行为的特殊考量。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领域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在1806年的耶拿战争,拿破仑击败了普鲁士军队。这一战不同于1870年的色当战争,当时普鲁士军队扭转了战局,大败法国。¹⁰两场战争之所以会有不同的结果,原因在于1806年的耶拿还未建成铁路,总参谋系统也处于襁褓阶段,枪管上拧刺刀的燧发枪是主要的步兵武器。但到了1870年,铁路和总参谋系统已经在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后膛装载步枪在当时取得了革命性的进展,并且成为标准的步兵武器,同时火炮也取得了重大的革新。战略、战术和武器深受这种进步的影响。简而言之,在耶拿战争和色当战争之间的64年间,战争的行为发生了转变。

这种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威慑所依据的详细军事运筹,导致威慑等式中的变量也随着时间而改变。例如,政策制定者在1939年考虑战争时所面临的问题与1800年时截然不同。克劳塞维茨对这一观点可能做了最好的阐释,他写道:“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战争类型、限制条件和独特的先入之见。因此,每个时代都坚持自己的战争理论,即使人们总是普遍地、迫切地希望根据科学原理来解决问题。由此得出,任何时代的事件都必须根据其自身的特点来判断。”¹¹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人们很难对适

用于所有历史时期的常规威慑作出有意义的概括。因此，有必要确定在一个特定的年代，是什么军事考量导致了威慑的失败。¹²

我选择把注意力集中在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的这段时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坦克并未出现，军队也不依靠机动（轮式）交通工具。欧洲军队基本上是由步行步兵和马拉火炮组成。在战争结束时，双方都派遣了大量机械化（履带式）的机动车辆。新武器的引入，特别是坦克，从根本上改变了战争的行为，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得到了明显的验证：德国仅仅用了六周就征服了法国。在下一章中我们会继续讨论坦克在常规战场上的影响。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常规战争的性质基本保持不变。如今，尽管武器装备（如坦克、大炮、战斗机）变得更加先进了，但它们本质上仍未改变；而且现在的军队也是按照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路径组织起来的。此外，理论家们今天辩论的也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相同的理论（例如，坦克相对于步兵和炮兵的重要性；近距离空中支援与地面部队的关系）。简而言之，过去的教训正广泛应用于现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当代问题的影响在美国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部分原因在于大多数民防分析师对军事史知之甚少。¹³人们普遍认为，出于当代的意愿，核武器已经消除了过去的武装，使人们丧失了研究它的动力。¹⁴此外，美国军事部队也没有强烈的意愿去利用其在早期的经验进行研究。¹⁵但是，在其他关心发动一场常规战争前景的国家，情况并非如此。例如，以色列军方特别注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役的研究，¹⁶而苏联不断强调着伟大卫国战争的教训。¹⁷强有力的线索把不远的过去和现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连续性使得我们能够提出与1939年威慑失败以及1973年中东威慑失败相关的命题。

当然，我关注的不仅仅是支撑威慑的军事考量，还有它们与政治利益之间更广泛的关系。对这种关系的概括可以适用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且都是有意义的，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与现代战场无关的威慑失败中的战争和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与这种更普遍的战争水平有关的许多问题都不受时间限制，处理战争行为的问题也是如此。¹⁸克劳塞维茨写于19世纪初的《战争论》，也阐释了这一观点。一方面，书中关于处理实际战场的战略和战术部分在今天基本上无关紧要，此外，《战争论》几乎没有提供

任何关于战场拒止的细节；但另一方面，克劳塞维茨对于战争的本质和战争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看法至今仍然很有见地，这也说明了此书经久不衰的伟大之处。

对理论和政策的启示

尽管我限制了研究框架的内容，但读者仍会很明显地看到，本书的研究范围包含了大量重要的历史事件：过去五十年中所有主要的大规模常规战争和一些不太重要的冲突。

人们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在不久的将来，常规战争的性质是否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我们没有理由期待这样一个转变。伴随着配备坦克和机械化车辆的部队越来越多，常规威慑理论将与未来的冲突息息相关。值得注意的是，该理论可以用来评估目前两类重要的政策问题：在有可能发生大规模常规战争的地区实行威慑的可行性问题，以及与影响威慑的军事战略和武器有关的技术问题。总之，常规威慑理论将会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有关威慑的文献

在有关威慑的文献中，有两个主题受到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第一个是超级大国之间的核威慑，¹⁹特别是与特定目标战略相关的核威慑。研究者提出了反击力损害限制和相互确保摧毁的概念，然而有关核威慑的文献对于常规威慑几乎没有什么启示。²⁰第二个是承诺回应的可信性问题，这被称为“承诺的可信性”问题。²¹人们对这一问题感兴趣的原因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一直设法利用其庞大的军事力量——核武器和常规部队——来阻止边界以外地区的冲突。²²无论承诺的威胁性质如何，美国由于其作为第三方或外部担保人的身份，不得不经常评估其

承诺的可信性。许多学者也已经在讨论“承诺的艺术”和“风险的操纵”等话题。²³还有两个相关问题值得注意。一是如果盟友遭受攻击,美国应该积极响应还是置之不理?二是如果需要采取一些行动,美国应在何种程度上作出回应?换句话说,关于使用武力应该设置什么样的限制?²⁴

然而,上述问题与本书研究并没有直接关系,因为,我关注的是在两支大规模军队互相对峙的局势中,防御方受到攻击时是否应该作出反应的问题。假设这两支部队立即互相纠缠,防御方作出反应的类型或程度应该很清晰:其肯定会自觉地动用所有可用的资源(非核武器)来挫败敌人。²⁵因此,考虑防御方响应的不同程度或不同选择于我而言无关紧要。

当涉及第三方时,承诺的问题可能与常规威慑相关。如果A方和B方互相对峙,当B方被A方攻击时,那么C方会如承诺的那样帮助B方吗?C方又会提供多少援助?我不讨论这些问题的原因有两个。首先,已经有大量的文献论述了与第三方承诺有关的问题;²⁶其次,这些问题在本书所研究的所有相关案例中都不重要,²⁷主要是因为第三方也通常会将其部分力量整合到盟友的部队中。美国对北约的承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成千上万驻扎在欧洲的美国军队就是用来确保美国将与欧洲盟国一同对抗苏联的攻击。²⁸

显而易见,我对威慑的关注都是从正在考虑战争的国家视角出发的。然而,我并没有将防御方的反应排除在外,因为常规威慑是双方能力的函数。进攻方主要想知道,反应有多大的效果,而不是防御方是否有反应。更具体地说,防御方的预期回应能否提供足够的恐惧威慑来阻止进攻?因此,我将讨论预期反应的具体情况,以及这种反应是如何影响常规威慑的。这些问题与现有文献中所讨论的问题是截然不同的。

方法和步骤

为了在事实上巩固我的理论,我使用了比较案例研究的方法。²⁹我选择了大量涉及威慑失败和成功的案例,并在现有证据的基础上尽可能详细地考察它们。然后我对这些案例进行比较来确定在决策过程中是否存

在类似的模式。接着,我将威慑成功和失败的案例进行比较以确定为什么战争有时会爆发,而有时不会。最后,我将成功和失败案例分别归类来寻找二者之间是否有相同的元素。我总共使用了 12 个案例:

- 1938 年英法在慕尼黑的决策;
- 1939 年至 1940 年英法的决策;
- 1939 年德国进攻波兰的决策;
- 1940 年德国进攻法国的决策;
- 1941 年德国进攻苏联的决策;
- 1945 年苏联进攻在满洲的日本关东军的决策;
- 1956 年以色列进攻西奈的决策;
- 1967 年以色列进攻西奈的决策;
- 1973 年埃及进攻以色列的决策;
- 1950 年朝鲜进攻韩国的决策;
- 1971 年印度进攻巴基斯坦的决策;
- 1979 年越南进攻柬埔寨的决策。

这些案例包含了现代战场上所有主要的威慑失败和成功的事件,而基于这些案例的现有信息几乎足以作出深思熟虑的判断。另外 6 个案例也包含在常规威慑的研究中:

- 1979 年中国进攻北越的决策;
- 1980 年至今的两伊战争;
- 1975 年北越进攻南越;
- 1965 年的印巴战争;
- 1939 年苏日在远东的冲突;
- 1973 年叙利亚进攻以色列的决策。³⁰

我的案例中只有两个明确代表了威慑的成功(盟军在慕尼黑的决策和盟军在 1939—1940 年间的决策),并且这两个案例是紧密相连的。尽管列表中没有包含多少威慑成功的案例,但这并没有对研究造成重大影响。作出发动战争的决定并不简单,总是会涉及相关决策者间的辩论和争议。在很多情况下,尽管一个国家最终决定要发动战争,但其在决策过程中也会有一段时期是威慑在起实质作用,就像德国在 1940 年 5 月决定进攻西线时一样。1939 年 9 月,希特勒告诉将军们他打算进攻同盟国,此

时威慑立即生效，一直维持到1940年2月，并且在1940年2月至5月间瓦解。其他涉及相似期间的案例有：1956年和1967年以色列袭击埃及的决策；1973年埃及决定攻打以色列；以及1940年5月之前的几个月里盟军的决策。³¹我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详细研究这些事件。在每一个案例中，每隔一段时间就有威慑的存在。因此，列表中威慑成功的案例数量足以解释为什么威慑有时可以化解危机。

之前的讨论表明，我的几个案例中也包含了不同的子案例。因此，我在比较12个主要案例的同时，也会比较子案例与其他主要案例的异同。由此可见，我的理论是在超过12个威慑成功和失败的案例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虽然我的研究推论基于这12个案例，但其中的一些案例的事件在其发展过程中相较而言更为突出。因此，我不得不关注导致或远离战争的决策过程的细节，我认为一旦战争爆发，战场上实际发生的事情并不直接相关。但是，为了解释为什么国家选择或反对战争，研究者需要知道实际的决策是如何做出的。不幸的是，这些必要的信息通常很难得到。

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三次侵略事件和同一时期内盟军的决策研究中，并不存在难以获取信息的问题，有大量档案材料可以获取。但是，中东的情况并非如此。在以色列，关于1956年的决策和1967年的决策都有相当数量的资料。不幸的是，官方记录仍然是封闭的。在阿拉伯，证据也是稀缺的，尤其是1973年叙利亚案例的信息。

当无法获得作出某项决策的细节时，调查者必须从战场上的事件进行推断。显然这一过程并不理想，但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所需的信息几乎完全缺乏，所以我对朝鲜（1950年）和越南（1979年）决策的分析基本上是基于纯粹的推断得出。另外，我还发现苏联决定进攻满洲（1945年）和印度决定对巴基斯坦发动战争（1971年）的资料也很少。因此，在我的理论形成过程中，这些案例的影响力远不及中东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案例。

第二章详细阐述了我的理论。在随后的三章中，我分析了理论发展的具体案例。第三章论述了英法在1939年9月宣战后并未进攻德国的决策；第四章论述了德国在1940年5月进攻盟军的决策；第五章论述了1956年、1967年和1973年发生的阿以战争。因为这些特殊案例极大地